



《四渡》的叙事革新 与红色史诗的美学新向度

■文/陈中国 马婉秋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、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,电影《四渡》以庄重的历史敬畏和文化记忆的“再符号化”美学实践,介入革命历史叙事的阐释空间,将一场铭刻于集体记忆与军事史册的战略行动从“已知的过去”转化为“可感知的当下”,使其在重新凝视中完成从历史事实到精神事件的审美转化。片名删去地域限定,由“四渡赤水”凝练为《四渡》,让“渡”不再单纯指代跨越江河的地理动作,更构建起贯穿全片的信仰性精神内核。影片在叙事层面做出四重创新性探索:以限知视角还原决策者身处绝境的不确定性,完成领袖形象的“去神圣化”重塑;以微观身体细节、具象物象完成抽象信仰的“肉身化”表达;以“顶底共生”交叉叙事平衡高层战略与底层个体,构建平等共生的革命共同体;以具备战略能力的镜像反派,在双向博弈中反向确证红军不可复制的精神力量。多重叙事手法彼此勾连互补,弱化主旋律影片常见的说教感,实现历史真实性、人性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三者有机统一。

消解“先验正确” 重构历史现场不确定性的张力

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存在叙事先天矛盾:观众预知最终结局,“后设全知视角”成为多数影片的默认选择。领袖被编码为全知全能、预判一切的先验主体,决策过程中的犹豫、试错、争论被刻意删减,革命历史简化为一条必然胜利叙事线,叙事张力被大幅削弱。《四渡》的核心叙事突破,在于彻底放弃“上帝式”全知视角,采用人物限知叙事,将叙事起点锚定在湘江血战的惨败现场,以满目鲜血、溃不成军的惨烈景象奠定全片压抑的叙事基调。影片不回避革命进程中的挫败与分歧,完整铺陈土城战役受挫、遵义会议路线博弈、苟坝会议激烈争辩等充满矛盾与压力的历史段落,层层递进构建充满未知风险的叙事场域。

影片最具突破性的创作选择,是直面领袖决策中的“认知不确定性”,完成领袖形象的“祛魅”与重塑。土城战役失利后,毛泽东陷入深度自我怀疑,甚至流露出想要卸卸重担的情绪。在传统红色叙事中,此类内心挣扎的表达往往被视作削弱领袖形象高度,而《四渡》反其道而行之:领袖的犹豫、反思与自我修正,非但没有弱化人物格局,反而让最终坚定的战略选择获得坚实的人性逻辑支撑。影片清晰地传递全新历史观:革命道路从来不是先天注定的正确选择,每一次精准判断都诞生于反复试错、自我博弈与集体争论之中。

限知视角的运用,让观众与剧中红军将士共享同一套信息盲区。观看影片时,观众无法凭借已知历史结局预判剧情走向,只能跟随人物一同承受包围、追击、粮草匮乏等危机重重的压迫感。这种叙事策略从根源上解决红色历史片“剧透式叙事”的困境,把冰冷的历史史料转化为充满悬念、痛感与抉择的真实历史现场,让观众真正理解四渡赤水不是一场轻松的战斗再现,而是绝境之下以血肉搏出的生存之路。

信仰具身化转译 让精神理念落地于肉身经验

如何将抽象的“革命信仰”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语言,是长期困扰红色题材创作的美学难题。过往影片多依靠口号等宏大抒情传递精神内核,容易造成信仰表达概念化,难以抵达观众的感性认知层面。《四渡》另辟蹊径,以微观身体表演、生活化物象细节构建影像修辞体系,将抽象信仰转化为看得见、可共情的肉身实践,完成信仰的具身化表达。

演员刘烨对毛泽东的表演塑造,成为

整套身体修辞的核心载体。区别于同类作品中领袖从容镇定、举重若轻的经典表演范式,着重刻画重压之下人物的身体状态:紧绷抽搐的面部微表情、长期疲惫下微微佝偻却始终倔强挺直的脊背。整套身体语言塑造出一种“承受中的坚定”:信仰不再是俯瞰战局的从容姿态,而是明知前路九死一生,仍强忍身心痛苦持续思索、持续决断的肉身坚守。这种表演逻辑跳出符号化演绎,以人的生理疲惫、情绪波动,还原领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负重。

影片巧用生活化细节物象,搭建精神表达的影像载体。苟坝会议后毛泽东手提马灯夜访周恩来,微弱灯火不仅照亮漆黑山路,更象征迷茫局势中不曾熄灭的信念;战地医院清洗纱布的生活化桥段,剥离领袖身上的战略符号,流露朴素温情,平衡战争叙事的冰冷残酷;侦察战士郭阔的旧军帽传递给流浪少年阿金的意象设计,构成信仰代际传承的凝练寓言。当信仰附着在人的肢体动作、一言一行与寻常物件之上,崇高理想便转化为可感知、可触摸的个体生命体验,观众不必单纯依靠理性理解长征精神,而是通过视觉感知、情绪共情,切身读懂革命者的坚守与牺牲。

打破单向层级叙事 建构革命共同体

传统战争片普遍采用“高层指挥—底层执行”单向叙事结构,上层战略推演占据叙事核心,基层士兵仅作为宏大战略的“工具人”、牺牲符号存在,个性、生命诉求被集体叙事淹没,形成精英与群众二元割裂的叙事短板。《四渡》采取“顶底共生”的交叉叙事策略,以上层领袖战略博弈、下层普通战士生存成长两条线索平行交织,借助平行蒙太奇完成双线互文,重塑革命叙事的主体关系。上层叙事聚焦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在指挥部沙盘前的推演、争执与决策,承载战争的宏观战略维度;下层叙事塑造一组具备完整性格弧光的独立小人物:老兵赵德发、侦察兵郭阔、嗜吃刺梨干的罗兴山、出身匪窝的流浪少年阿金。影片为底层人物设置专属成长线,以生活化互动消解功能性配角的扁平感,让小人物拥有独立于高层叙事的生命价值。

两条叙事线索以“渡”为核心动作形成辩证呼应:统帅在战略层面渡过绝境困局,士兵在身心层面渡过恐惧、迷茫、身份枷锁。二者互为支撑、不可分割:若无基层战士以血肉身躯执行战术,沙盘上的谋略只是纸上空谈;若无高层精准的战略布局,士兵的牺牲只会沦为无意义的损耗。高层智慧赋予牺牲历史价值,底层坚守赋予战略现实力量,二者共

同构成完整的革命共同体。

“顶底共生”的交叉叙事策略从根本上跳出“英雄/群众”二元对立框架,回答了红军打不垮、散不尽的核心历史命题:这支队伍的力量从来不只依靠少数领袖的谋略,而是顶层战略自觉与底层精神自觉双向融合的结果。高层与基层不再是指挥与服从的等级关系,而是共乘“信仰之舟”、一同渡河渡难的平等主体,为新时代红色题材群像叙事提供全新创作范式。

以对手的复杂性 辩证确证革命主体的内在力量

敌我对抗是战争片的核心叙事线索,过往红色影片常采用脸谱化反派塑造方式,刻意弱化敌方将领的战略能力,将国民党阵营简化为一盘散沙的无能集团。这种叙事处理虽能快速烘托红军胜利,却让胜利失去历史重量,落入“敌弱我强、我方必胜”的廉价叙事误区。《四渡》借鉴“双雄博弈”的叙事模式,将蒋介石及国民党阵营塑造为具备完整判断力的镜像对手,在双向战略博弈中完成革命主体性的深度论证。影片客观刻画蒋介石形象,呈现其具备全局战略视野、手握数倍于红军的兵力与物资优势,甚至能够预判红军部分行动思路。娄山关段落设计虚实交织的跨时空对峙镜头,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略思维并置,写意化呈现双方层层拆解、相互预判的心理博弈,赋予军事对抗强烈的心理张力。同时,影片客观呈现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、各怀私心的权力矛盾,精准描摹利益集团内部的天然裂痕。

从叙事功能来看,敌方阵营是红军的镜像对照物,双方的博弈本质是两种价值体系与两种初心的对决。蒋介石受制于阶级立场与权力桎梏,虽拥有充足资源,却无法凝聚人心;国民党军队作战只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,缺乏底层根基;红军上下同心、军民一体,一切突围与牺牲最终指向解救苍生。对手越强、算计越深,越能反衬红军胜利的来之不易,证明红军的取胜根源不在于兵力装备优势,而在于不可复制的信仰共同体力量。

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断迭代的行业语境下,《四渡》的叙事实践证明:红色影像唯有回归历史现场的真实、尊重个体人性的复杂、平衡宏大叙事与微观生命,才能让革命历史持续释放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,为新时代红色影视创作开辟更广阔的美学道路。

(陈中国,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党总支书记,二级编剧;马婉秋,中央戏剧学院教师,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产业委员会副秘书长)

孤灯凝炬,聚散成局 ——电影《四渡》的影像叙事革新 与“核心”生成逻辑

■文/龚德全

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,《四渡》并未满足于对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的影像化复述,也没有将叙事重心简单安放在敌强我弱、围追堵截、绝境突围的战争奇观之上。影片的深层用意,在于以领导核心的确立为内在主线,推动战争叙事向政治叙事、组织叙事和精神叙事展开。

由此,影片超越了单纯战役片的表达范畴。它所呈现的,不只是红军如何在强敌环伺中赢得战略主动,更是中国革命在重大挫折之后,如何在艰难探索中重新校准方向、凝聚共识,并在历史选择中形成坚强领导核心。也正是这一意义上,《四渡》的价值不止于再现一场经典战役,而在于追问:这场胜利何以可能?

叙事重心由外部对抗 转向内部秩序重构

在传统红色战争片的叙事惯性中,敌我对抗往往构成主要戏剧结构:敌强我弱、围追堵截、浴血突围,战场上的攻防胜负成为推动故事前进的基本动力。《四渡》的独特之处在于,它并没有沿着这一既有路径展开,而是主动调整战争片的矛盾重心。该片以湘江血战后的沉重开局开篇,将观众带入一个更深层的历史追问:强敌压境之外,真正使红军陷入被动的究竟是什么?影片给出的答案,并不止于军事层面的失利,而是指向战略判断失准、指挥体系紊乱及由此造成的组织秩序危机。

由此,《四渡》在类型表达上形成了鲜明的“破局”意识。导演有意淡化大规模战场奇观和密集炮火场面的铺陈,而将更多篇幅投向会议空间中的路线争论、沙盘推演中的方案分歧,以及艰难局势下不断展开的思想压力和战略权衡。遵义会议召开之前,影片呈现的并非一支目标清晰、号令统一的队伍,而是一种“散”的状态:路线摇摆、指令反复,高层难以统一判断,基层只能在频繁变化中被迫应对。影片也由此将战争叙事的焦点,从敌人如何围困红军,推进到红军如何重新组织自身。

这一叙事转向,显示出创作者并未停留于战役结果本身,而是试图进入党史发展的内在逻辑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:“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,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,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。”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下,《四渡》没有把四渡赤水处理成单纯的以少胜多传奇,而是把镜头推进到胜利形成之前,着力呈现方向在挫折中辨明、共识在分歧中凝聚,并由此重建领导秩序的过程。

以画面秩序镜像 革命政治秩序的重建

《四渡》并不满足于以台词阐释或情节铺陈完成历史判断,而是通过机位、构图、光影、剪辑等视听元素的递进变化,建立起一种可感的影像秩序。它以“散”与“聚”的视觉对照,呈现队伍从分散到凝聚、战略从犹疑到清晰、权威从争议中逐步显明的过程,以及政治秩序重建的历史进程,由此获得了可被观众直接感知的视觉经验。

遵义会议召开之前,影片有意保持一种不稳定的视听状态。晃动的手持镜头、带有压迫感的倾斜构图、冷灰低饱和的色调,以及多线交错快速剪辑,使行军、争论和临战调度都笼罩在紧张、逼仄的气氛中。人物关系也常被处理为分离或拉扯的状态:沙盘前的意见难以汇拢,行军场面则呈现出拥挤、杂乱的视觉形态。这里的“乱”,不是对战争艰险的外部渲染,而是对战略方向未明、指挥秩序不畅这一现实处境的影像回应。

从遵义会议到苟坝会议之后,影片的镜头语系统随之发生转向。固定机位逐渐增多,构图趋于稳定,光影由冷峻压抑转向开阔自然,剪辑节奏也不再一味追求急促冲突,更多依靠连贯的镜头调度呈现判断、讨论与决策的生成过程。尤其是沙盘戏的变化颇具意味:前期的沙盘更像分歧的集中显影,后期的沙盘则成为战略共识形成的视觉中心,人物围绕同一作战逻辑展开推演,画面关系也随之由分散转向聚合。

由此,《四渡》的影像表达并非停留在战争场面的外在调度,而是把政治秩序的重建转译为画面秩序的修复。观众看到的是战局由被动转为主动,影片揭示的却是更深层的历史逻辑:军事突围的实现,不只依靠战术机动,更有赖于革命队伍在思想、组织和领导层面重新形成统一方向与领导核心。

人物弧光与敌我镜像 共证“同心突围”

《四渡》对领袖形象的处理,并未沿用预设式、符号化的塑造路径。影片没有把权威呈现为天然生成的结果,而是将其置于复杂历史情境中展开:从分歧、承压到求索、验证,构成了人物弧光的基本层次。由此,权威的形成不再只是历史结论的直接呈现,而成为一段被影像重新打开的生成过程。

在毛泽东形象的建构上,影片没有把“正确”处理为无需说明的先验结论,而是让其具体历史条件中逐步经受辨认与验证。山地机动、灵活穿插、避实击虚,后来被凝练为四渡赤水的经典战法;但置于当时的军事压力与组织分歧之中,这些判断并不天然具有共识基础。会场上的迟疑、沙盘前的反复推演、争论后的短暂静默,使战略判断呈现出由个人洞见进入组织认同的生成轨迹。苟坝深夜独行一场尤为克制:马灯、山道、背影和缓慢展开的长镜头,并未诉诸外在化的领袖光环,而是在低限度的影像调度中托出战略抉择的孤独感、压力感与历史分量。

由此,领导核心在影片中不是作为既成事实被推至前景,而是在一次次危急关口中逐步显现其组织意义。毛泽东的权威感,也并非依靠外部神化加以托举,而是生成于对全局走势的判断、对重大风险的承担,以及在屡屡受阻的局面中仍能打开生路的能力。正因为有了这些叙事铺垫,“核心确立”才不再停留于概念层面的说明,而获得了可感、可信的过程支撑。

与人物弧光相呼应,影片还在敌我双方之间铺设出一组组织层面的对照。国民党军队虽有兵力优势,并持续展开围追堵截,但其内部并非“铁板”一块:中央军与地方军阀之间各有盘算,命令传达层层耗损,前线部队难以真正形成合力。相较之下,红军在路线调整和指挥重整后,逐渐形成更为集中的行动意志。影片没有把普通战士塑造成洞悉全部战略意图的“全知者”,他们未必完全理解迂回穿插的深层用意,却能够在纪律、信念和共同目标的牵引下完成执行。

这一组对照,使四渡赤水的意义不再停留于战术层面的胜负转换。兵力、装备、地形固然构成战场上的硬约束,但真正改变局势走向的,是红军在危急关头重新获得方向感、组织力和行动一致性。敌强我弱的态势依然存在,战场主动权却在内部秩序的重建中悄然易位。由此看,四渡赤水不仅是一场以少胜多、以弱制强的军事奇迹,更是一支革命队伍在困境中完成凝聚与定向的历史见证。

红色叙事从结论宣教 走向过程审美

近年来,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常面临一个难题:历史结论早已为观众熟知,影像叙事如何避免成为既定意义的重复说明。《四渡》的可贵之处,正在于它没有把四渡赤水的胜利处理为预设答案,也没有急于借台词和情节完成价值宣示,而是把叙事重心放在结论生成之前的复杂过程之中。影片真正着力,是在分歧逐步消化、判断不断验证的过程中,呈现权威是如何转化为行动一致性的。这里的“过程”,不是对史实环节的机械铺陈,而是把历史必然性重新放回犹疑、争论和选择之中,让观众看到结论何以成立。

因此,《四渡》的创作革新不只是题材与战争场面上的更新,更在于它重建了红色叙事的审美路径。影片让观众进入历史现场内部,在行军、会议、争论与突围之间,感受革命事业由危局走向转机的内在逻辑。它不是把“核心确立”作为现成结论加以宣讲,而是通过影像节奏、人物关系和组织状态的渐次变化,使这一结论在观看过程中自然浮现。由此,红色叙事从单向度的意义传达,转向更具沉浸感、思想辨度和情感说服力的过程审美。

赤水奔流,光影流转。《四渡》的厚度,并不止于几次经典战术机动,而在于它以成熟的电影语言,重新打开了中国革命由危转机、由散到合的历史逻辑。影片所呈现的,不只是一次军事突围,更是革命队伍在挫折中确立方向、凝聚共识、形成领导核心的过程。由此回望历史,我们更能理解“确立核心”对于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根本意义,也更能体认“两个确立”的深厚逻辑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,《四渡》超越了单纯战史复刻,获得了持久的文艺价值与思想力量。

(作者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、三级教授,博士生导师,享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)